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全面抗战时期的
中国金融现代化



刘志英 / 著

 科学出版社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
学术文丛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

刘志英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为日军所占领，中国金融业最集中的东中部地区大部分沦陷，中国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随着国民政府西迁与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中国现代化金融业从东部转向了西部地区，开启了中国西部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本书从现代化视角入手，展现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及抗日根据地金融业现代化发展进程，试图探寻中国西部和抗日根据地金融业在逆境中如何趋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轨迹，探讨国民政府与根据地政府金融改革的举措得失，以及金融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金融管理等寻求历史的启迪。

本书可供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读者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 / 刘志英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03-053553-5

I. ①全… II. ①刘… III. ①金融-经济史-研究-中国-1937-1945
IV. 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2566 号

责任编辑: 王 媛 / 责任校对: 彭 涛

责任印制: 张克忠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11837

E-mail: 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插页: 1

字数: 282 000

定价: 7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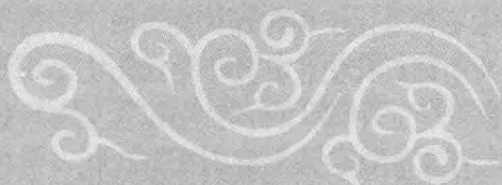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发展与地域分布	13
第一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华外资现代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分布	14
第二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华资现代化金融业的发展与分布	29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传统金融业的发展与地域分布	52
第二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大迁徙	57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建立与内迁	57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银行业的大迁徙	65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保险业的大迁徙	85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重构	93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金融中心的建立	94
第二节 西南西北金融网的构建促成了大后方的金融现代化	109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	122
第四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发展	141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统制	142
第二节 国统区的金融法规与金融监管	153
第三节 根据地的金融法规与金融监管	167
第五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金融家与现代金融人才的培养	187
第一节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金融家	188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家	197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金融人才的培养	204
第四节 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金融人才的培养	213
结语	219
参考文献	223
后记	234



导 论

一、“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历史时期。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历了长期的讨论，到 20 世纪末期，史学界才大体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应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1997 年，胡绳先生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创刊 100 期时建议：“把 1919 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 1840—1949 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个题词发表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人们基本形成了共识。^①

这样，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终于得以确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这个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是从 1840—1949 年，大约 110 年的历史。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应该说，这个认识是符合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确立，是在几代学者长期探索、争鸣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科学的学科体系。^② 本书所讨论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即是把中国放在 1840—1949 年这样一个时段中进行考察的。

^① 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309 页。

^②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12 页。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极为重要又极为特殊的时期。这不仅是由于中国近代史组成了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更是因为中国近代史正好处于中国历史最为复杂而又关键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既产生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绵延不绝的激烈革命斗争，又发生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化（现代化）的曲折艰辛的转折。这种革命与近代化（现代化）^①的“双重变奏”，便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观察和研究的视角，从而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或“主旋律”问题的不同看法（为叙述方便，本书统一采用“主旋律”的提法）。

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一样，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旋律问题，在整个20世纪同样也经历了一段波折。从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关于主旋律，学术界存在着“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两种看法。前者由蒋廷黻在1938年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中提出，只是蒋廷黻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以来，在中国大陆并无多少应和者，但在国外史学界，却应者众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才重新重视蒋廷黻所开创的现代化范式。而“革命史范式”，则随着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等一系列著名论断的提出，得到了范文澜、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广泛认同，这些历史学家以革命史范式作为研究和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察点，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史范式更是在中国史学界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问题一直是整个中国近代史最突出的问题，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人民首当其冲的历史任务。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革命史范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并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类著作，大体上都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编著的。^②所谓“范式”，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美国学术界传入中国，由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的概念。它大约是指研究中国近代史过程中，人们所遵循的某种规范。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的“范式”，与本书所说的学科体系有相近似的地方。

“革命史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主要视角，来

^① 在英文中，“近代化”与“现代化”均使用的是同一个词“modernization”，尽管两者在时间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为便于行文的方便与概念的统一，本书统一使用的是“现代化”一词。

^② 蔡礼强：《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第86—91页。

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因而，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主要任务，它也成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革命史范式”的具体框架是围绕一条线索（“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前引毛泽东语）、三次高潮（指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八大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而展开的。应该说，“革命史范式”在当时中国，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人心和中国化，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推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也成为20世纪50—80年代初最为繁荣的优势学科。然而，革命史范式的绝对化，也造成了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混同，学术研究领域愈益走向片面、狭隘，学术研究成果也呈现越来越教条化、脸谱化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现代化逐渐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实现现代化成为人们的共识，社会的语境亦由“革命”向“现代化”转换。现代化反映到社会学科领域，指的是以现代化问题和现代化视角来进行观察与研究，现代化成为了学术界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广泛采用了“现代化”概念，进行了关于各种相关学科的讨论，尽管看法不尽一致，但关于现代化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大致的概括。根据现代化理论的原本含义，“现代化”是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下简称“从传统到现代”）发展的理论，它一般指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急剧变革、工业化进程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指经济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现代化生产力为发展目标、努力追赶的过程。^①因而现代化实质上也就是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学说。从学理上来说，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体系，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从过程来看，它发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贯穿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阶段；从内容来看，它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为主要标志，并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发生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的产生

①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和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逐步演进的，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规律的理论总结，反过来，现代化理论又指导人类进行现代化建设。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爆发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欧洲内源性的现代化，中国通过革命化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对中国现代化的形式和道路具有特殊影响。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就现代化的特定意义而言，中国现代化只是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多流向中的一个流向；20 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化才异常艰难地上升为中国近世社会大变动诸多流向中带有主导性趋势的流向；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化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即占据大变革诸多流向的支配地位。^①

中国现代化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其内涵与西方的现代化显然有重大区别，它不单单是工业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虞和平先生将其概括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化；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国富民强的工业化；反对专制、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民主化”，即“民族化、工业化、民主化”这“三化”。^②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与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分割开来的，更不可能是对立的，否则就背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近代中国，现代化与革命是同时存在和相辅相成的，并且革命往往起到为现代化扫除障碍的作用。

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之一，以“现代化”来建构近现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当然是正确的。目前现代化仍是实现“中国梦”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和任务，历史研究有责任去深挖和总结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新范式要取代“革命史”的旧范式，因为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③事实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43 页。

^② 周东华：《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与中国现代化——评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史学月刊》2003 年第 2 期，第 102—107 页。

^③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7 页。

上，现代化范式只不过冲破了以革命史范式作为唯一的研究模式的藩篱，在革命史范式之外建构了一个与之竞争但并非完全互相排斥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面对复杂的历史图景，我们不能奢望用一种研究范式或方法就穷尽对历史的认识，因为任何理论都不能无条件地被完全采用。

何谓“现代化范式”？罗荣渠先生言简意赅地做了回答：“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①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伴随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潮流中的一种，它既有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会受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影响，又有自己的内在因素和道路选择。因此，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既要运用现代化的有关理论原理，更要建立和运用适合中国现代化特点的解释体系。

其实，近代以来，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是中国自强救国、寻求生存发展的两大主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1995年底，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谈到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明确认为：“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做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他还强调：“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得到解释和解决的。”^②现代化视角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领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逐渐形成“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研

^①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冬季卷，总第17期。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8页。

究成果迭出，而且在许多领域都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在研究中不应该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对立起来，而是要结合起来。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首先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我们发现它们无不或多或少地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我们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如果我们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忽视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如果在“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及它们对革命进程的反作用，我们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现代化范式的运用，引入了生产力的研究视角，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价值观与诠释历史问题的新方法。然而，如果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忽视“革命史范式”的主导作用，就可能狭隘地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不为智者所取。

可喜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近代史中关于“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通过 30 多年的不断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做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革命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①。事实上，离开“革命”，便无法全面贯通地阐述中国近代史，“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叙事并不排斥，甚而可以兼容互通。

二、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经过全民族的浴血奋战，最终取得彻底胜利，将

^①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40页。

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一场战争，同时它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是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无论是从宏观或是微观角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主要集中于民族民主革命，从研究中，人们看到了这场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以及中国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导下，抗战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们仅用这种范式研究抗日战争是不够全面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范式”再次受到史学界的重视，“现代化范式”也逐渐应用到了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90年代以后，有人才开始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过极大影响，人们才试图以“现代化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令人欣喜的是，三十多年来，对现代化与抗日战争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①

首先，这些成果认真探讨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作用。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近代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这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打断了这场自强运动的现代化进程，日本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掠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后来又向中国勒索了收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白银赎金。这些赔款总和，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加速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破坏和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内战停止，经济开始再次腾飞，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局部与全面侵华战争，再一次粗暴地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中国拖入了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东北，除了掠夺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物质资源外，还

^① 就笔者所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张静如：《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7页；王立胜：《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3—8页；时荣国：《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27—30页；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期，第115—119页；袁成毅、范展、金普森：《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第1—26页；吴国军：《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研究》，中国石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第1—33页；荣维木：《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第13—15页；荣维木：《另一种视角：从抗日战争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顿挫与嬗变》，《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第39—44页。

更为严重地建立起殖民地经济体系，把东北完全地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东北经济的畸形。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打断。八年间，日本占领许多中国城市，达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总数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有的工业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条件从而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而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现代产业和国民总收入不仅未得到发展，反而发生了严重倒退。不仅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未能超过战前的水平，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直到1952年，中国经济才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原地踏步了整整16年之久。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是5000亿美元。因此，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腰斩了中国自1912年以后逐步开展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摧毁了中国原先积累的现代化成果，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严重阻碍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日本侵华战争不仅在经济上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打乱并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政治上，战争的特殊条件使国民党集权变成了现实，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人民在此后继续争取民主斗争的成本和代价。

其次，这些成果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新的现代化因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将这样一场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灭亡中华民族的战争，转变成一个中华民族由屈辱到荣耀的复兴枢纽。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国民政府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是这种积极应对的结果。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所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抗日战争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摧毁了中国原先积累的现代化成果，严重阻碍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抗日战争也促成了新的现代化因素向一些地方的转移，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西北大后方，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方的政治、

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具有现代化性质的各项建设，这些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都产生了建设性效应。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与重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国统区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范式的研究。

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逐渐有学者开始重视与关注以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复兴，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大后方，现代化建设明显加快，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也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引向了现代化之路。这场战争给西部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使之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缩短了与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差距。这些内容，在现今的学术界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于是，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不仅走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而且研究得以快速推进，日益成为了学界广泛关注的新的研究重点与热点。正是在这样的研究中，笔者也开始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这一问题。

三、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涉及多层面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变的过程。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的进程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它也是一个金融发展与深化的过程。就金融现代化而论，现代化必然要涉及技术、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

从晚清开始艰难起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到抗战以前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金融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一切社会经济事业的中枢，它的兴衰直接反映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动。

金融的现代化属于经济层面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工具与途径。经济现代化离不开金融现代化，而金融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构件，也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终极的显著标志。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比较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发展水平，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客观地区分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金融，就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中国。如果中国金融体系能够健康发展，它就能大大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提高投资效率与生产效率，从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地高速地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指的是近代以来，中国金融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整体转型过程，就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创新，中国金融业逐渐从传统阴影中

走出，开始迈上按现代形式组织、管理、经营的发展之路的过程。中国金融现代化并非直接或被迫移植、嫁接西方模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的过程。

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发展情况已经有了相应的关注与研究，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现代化研究——以银行业为例》，通过对北洋政府时期作为金融主体的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发展原因的探索，考察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现代化特征，并分析在当时中国特定环境下阻碍早期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些因素^①；《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向》，探讨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十年间，国民政府建立现代化国家金融体系，将科学体制引入金融界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推动金融现代化的进程^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金融的现代化转型初探》，梳理了抗战爆发前四川省农村出现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和现代化金融业务，探讨了四川农村由传统金融向现代化金融的转型及其作用^③；《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一书，选择近代中国金融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业银行进行研究，在探讨商业银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又牢牢抓住制约商业银行生存、发展、壮大的核心——盈利性问题展开分析，厘清了金融现代化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中国商业银行从产生到发展 40 年间（1897—1937 年）盈利性行为的考察，认为中国金融现代化并非直接或被迫移植、嫁接西方模式，而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的过程^④；而吴景平教授在《上海金融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不仅对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化金融中心、其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做了考察，而且还对上海本土的钱庄业、外来的洋商银行、中国人自办的新式银行业，在应对中国经济与社会重大变迁和市场竞争中，为实现金融制度和金融机制方面的现代化转型做出的努力和一些杰出的金融家群体为上海金融的现代化起到的重要推进作用，以及金融学理和金融实务在近代上海的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⑤此外，2002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市档案馆、

① 马华：《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金融现代化研究——以银行业为例》，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 5 月，第 1—46 页。

② 赵秀芳：《抗战前十年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趋向》，《文史哲》2003 年第 4 期，第 55—61 页。

③ 张建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农村金融的现代化转型初探》，《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第 15—18 页。

④ 兰日旭：《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

⑤ 吴景平：《上海金融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编：《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02—215 页。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共提交 26 篇论文，内容以近代上海金融现代化为中心，涉及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影响、上海银行公会、近代上海的外国银行与本国银行、上海保险证券市场、上海金融风潮、上海银行家的历程；等等。^①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不仅统一了货币，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基础，而且健全了金融组织，建立了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金融体系，客观上推动了金融现代化的进程。金融界也以此为契机，拓宽业务，引入科学体制，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加快了金融业的现代化步伐。但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金融现代化的进程被打断，东部地区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遭到破坏，所存物资和现钞也被日伪大量抢夺；在破坏了原有的金融系统后，日本银行的分支机构开始在沦陷区建立起来，大量发行军用票；稍后，日本又扶持伪政权建立银行，发行“华兴券”“中储券”等伪券，通过这些手段，日本建立起了掠夺沦陷区人民的伪金融系统，中国东、中部地区金融和人民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将整个金融系统进行大迁移，迁移到相对落后、传统金融业占主导地位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在金融业方面，全面抗战前西部地区的金融仅仅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雏形，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金融业，然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以及现代化金融机构的移植，西部的金融业得到极大的改善：国民政府极为重视对大后方金融业的控制，四大银行先后将总行迁到重庆，并在西南、西北分别建立了分支机构，同时国民政府完善了省地方银行与县银行，完成了对西南、西北金融业的垄断，建立了庞大的西南、西北金融网络，甚至将金融势力深入到了农村。国家金融资本虽然在政治上构成了国民党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但在经济上由于其资本的相当部分还是用于建设事业，所以国家金融资本对经济建设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观察，对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金融现代化问题，学界的研究虽少，但仍有所涉及，如有学者以银行立法为视角，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的现代化演进进行单线式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深入考察与理论分析，特别是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央银行在金融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① 吴景平、史立丽：《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 年第 5 期，第 180—182 页。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有学者以国民政府的国家农业专业银行为中心，考察和评价其对农村金融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还有学者对近代（主要是抗战时期）西北农村资金融通由传统借贷的方式向现代农村金融合作的方式的转变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研究。^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金融现代化，即是指在以西南、西北为主体的广大国统区和在以农村为依托的广大抗日根据地，金融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金融现代化问题，从研究范围来说，本该包括整个中国，而战时的中国，大致分为沦陷区、国统区与根据地三部分，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加之各区域的情况又十分复杂，特别是沦陷区的中国金融现代化在遭遇日伪大规模破坏的基础上，沦陷区又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金融机构，来为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服务，这些金融机构恰是对中国金融现代化的破坏，因此，我们关注战时中国金融现代化问题，便排除了沦陷区区域，重点关注国民政府统治的西南、西北为主体的国统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根据地。这两部分地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是中国现代化金融最为薄弱的地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为日军所占领，中国金融业最集中的东、中部地区大部分沦陷，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与抗日根据地的陆续建立，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落后的金融业得到改变，且建立了大量的现代化金融机构，制定了现代化的金融制度，这些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为抗战时期国统区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现在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的金融现代化研究则相对薄弱。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化的金融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了西部地区，由此开启了中国西部金融业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本书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掌握较为充分的第一二手资料，从金融现代化的角度入手，展现抗战时期大后方及抗日根据地金融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并试图探寻中国西部和抗日根据地的金融业在抗战这样的逆境中如何趋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轨迹，及其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国民政府与根据地政府金融改革举措的得失及金融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当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金融管理等找寻了历史的启迪。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魏浩然：《中国中央银行的现代化（1928—1945）——以银行立法为视角》，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41页；邹晓昇：《中国农民银行与农村金融现代化》，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5月，第1—36页；王颖：《近代西北农村金融现代化转型初论》，《史林》2007年第2期，第36—43页。